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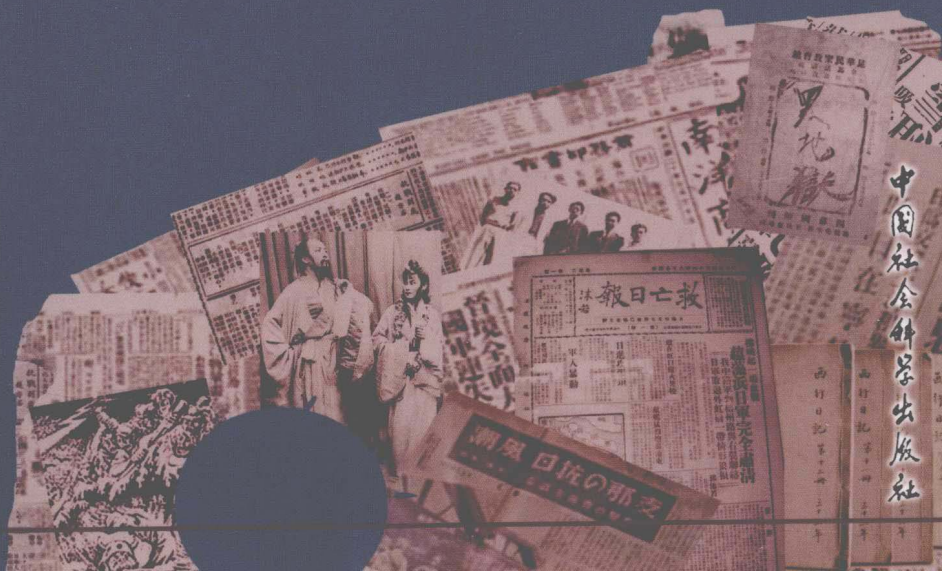
GUILINWENHUACHENG WENXUE YANJIU CONGSHU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桂林文化城 散文研究

GUILIN WENHUACHENG
SANWEN YANJIU

刘铁群 著



GUILIN WENHUACHENG WENXUE YANJIU CONGSHU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桂林文化城 散文研究

GUILIN WENHUACHENG
SANWEN YANJIU

刘铁群 著

（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桂林文化城散文研究/刘铁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004-7750-1

I. 桂… II. 刘… III. 散文—文学研究—桂林市—现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124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崔注中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57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雷 锐

“桂林山水甲天下”，秀丽的风光景色给桂林带来历史上的美誉，使其举世闻名；而抗战时期，她又以“文化城”的骄傲称呼，蜚声全国。素来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南疆广西，由于“桂林文化城”的辉煌成果，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留下格外光辉的一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多的时间里，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沦陷。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位于前线与后方腹地之中的桂林的地位一下子突出了起来。从此时起到1944年秋湘桂大撤退为止，长达六年的时间里，由于桂林特殊的政治、军事、交通条件，大量文化人和文化机构云集于此，大批文化团体相继成立，出版业空前繁盛，文化刊物相竞而出。文人荟萃，群彦毕集，当时旅桂、暂居、长住的文化人达一千多人，全国闻名的达二百多人。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积极从事抗战文化活动和文艺创作，成果丰硕，业绩辉煌。一时之间，位于西南边地的山城桂林“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①

^① 千家驹：《在桂林的八年》，载《学术论坛》1981年第1、2期。

抗日战争是全面的战争。除了军事斗争、经济、外交战线之外，文化战线的斗争也相当激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抗战初期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战线都现出失败的状态：军事一溃千里，外交低眉顺目，经济左蹙右绌。独有文化，多少呈呐喊战斗激昂沸腾之势，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胜利的希望。从战争初期压倒性的态势，到漫长的相持阶段之苦撑，直到最后艰辛的惨胜，中国抗战文化一直释放出绵绵不绝的顽强力量，配合着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合力，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作为中国文化战时堡垒的桂林文化城，其身上蕴藏的独特内涵，有着极为宝贵的思想文化意义。

桂林文化城产生于1938年秋以后，其形成、发展是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同步的。整整六年里，在敌我双方犬牙交错、你进我退之中，桂林见证了战争中最漫长、最坚韧、最顽强的抵抗与期待。桂林文化城是抗战、特别是相持阶段的产物，反映出抗战及其相持阶段政治、文化的几乎所有历史。作为桂林文化城的文学，体现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变化、生活、斗争，很自然地就带上了相持阶段的特点：错综复杂，曲折起伏，丰富深刻。桂林文化城文学产生、同步、结束于相持阶段，时间之长是其不幸，而获得生活之丰富又是其大幸。

相持阶段的特点，又使桂林文化城文学典型地反映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变化。由于桂系领导人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复杂关系，桂林比起大多数中国其他地方更易于体现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又团结又斗争的政治现象十分鲜明，但总的来说，团结仍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情况符合整个中国抗战历史的状况，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1944年2月到5月湘桂大撤退前，在桂林举办了西南五省戏剧展览会，成为中国戏剧史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盛举。这一光辉成绩，正是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实践在桂林文化城文学及活动中的成功反映，是大后方别的城市在当时所难以相比的。

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及其存在的时期，1938年10月到1944年6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和结束，1939年9月到1945年5月，时限上非常接近，几乎同步。因此，桂林文化城不仅经历了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困苦、曲折起伏，又比较特殊地体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因而桂林文化城有着一种沉重的历史沧桑感和一种伟大的历史创造感，使自己对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阵线中的位置有比较清晰的体会。桂林处于后方的交通枢纽上，为西南各省战时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外交活动频繁，接触外国友人的机会仅次于重庆。在越来越多的交往中，桂林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一员的责任和自豪。时代、环境迫使桂林文化城，也促使桂林文化城的文化作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开放，形成了开放性极强的符合文化现代化需要的特点。立足桂林，胸怀全国，放眼世界，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因而有着较为宽阔的视界，较为现代的眼光，其反映场面、生活的广度都比抗战初期明显进步。

特殊的文化现象和辉煌的文化成绩，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矿藏。20世纪50年代开始，桂林文化城研究已经开始起步，但形成比较引人注目的规模和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还是80年代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解放了研究工作者的思想，带来了研究界的春天。从80年代至90年代，桂林文化城资料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收集，一批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得以问世，但这一工作远没有完结。进入21世纪，桂林文化城研究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文化意义。单看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亡魂不断再现，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再三否认侵略历史，中国

抗战文化、历史研究、桂林文化城研究就应该更加加强和深入。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特别铭记“九一八”的“国耻”，也要铭记“九二”的“国荣”——那是多少中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用这种精神激励我们不断奋进，重铸民族灵魂，振兴中华！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编写了这套《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第一批专著暂定五本：《桂林文化城小说研究》、《桂林文化城诗歌研究》、《桂林文化城散文研究》、《桂林文化城戏剧研究》、《桂林文化城文人生态研究》。我们力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新的理论、从新的视角拓宽研究领域，总结新的观点，进一步将桂林文化城研究向前推进。期望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和研究界同行的支持和指正。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它的责任，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份责任，既对不起创造文化城的前辈，也将为后代子孙所责问和讥评。

创造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前辈们是光荣的，为后代子孙所景仰；发掘和整理桂林文化城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工作者也是光荣的，在中华民族抗战文化史的史页上，可以隐约见到他们辛勤的汗水。

2006年9月2日抗战胜利六十一周年纪念日

目 录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穿越黑暗的飞翔——巴金在桂林文化城的 散文创作	(11)
第二章 多维的抗战图景	(29)
一 对将士们英勇战斗场面的真实记录	(29)
二 对普通民众无私援战的朴实描述	(33)
三 对文人们抗战决心的深沉书写	(37)
第三章 惶惑与忧伤	(40)
一 生之多艰的痛苦	(41)
二 黑夜彷徨的迷惘	(45)
三 人生价值难以实现的忧伤	(48)
四 面对残缺世界的焦虑	(50)

第四章 悼念与追忆	(55)
一 对战争中死去的亲友、战士的悼念	(55)
二 对鼓舞民族精神的先行者的追忆	(61)
三 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与对亲人、友人的回忆	(68)
第五章 山水 风土 人情	(74)
一 山水景物	(74)
二 风土人情	(83)
第六章 讽刺 暴露 批判	(92)
一 对反战人士的声讨与批判	(93)
二 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消极抗战人士的批判	(101)
三 对思想分歧者的批判	(103)
第七章 救亡呼声中对启蒙的坚守	(108)
一 对个体尊严的关注	(110)
二 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114)
三 对教育问题的关注	(120)
四 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123)
第八章 战争背景下对生命的关照	(127)
第九章 对妇女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146)
一 概况	(148)
二 思考妇女问题面面观	(152)
三 结语	(167)

第十章 感受艰辛 目击灾难·····	(168)
第十一章 聚焦事实 记录战争·····	(190)
一 关于南中国战场时事的报告文学·····	(191)
二 反映香港战事与脱险经历的报告文学·····	(198)
三 其他题材的报告文学·····	(200)
第十二章 杂文与散文小品并重的《野草》杂志·····	(205)
一 关于桂林文化城时期的“野草作家群”与 《野草》杂志·····	(207)
二 记录并“抒写”抗战历史的记忆——《野草》 中的散文小品·····	(219)
三 “反响”并“抗争”抗战的社会现实——《野草》 中的杂文·····	(240)
四 直面社会、直面人生——《野草》中的漫画与 木刻作品·····	(264)
桂林文化城主要散文家作品目录·····	(274)
后 记·····	(302)

绪 论

1937年，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而散文所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因为在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既开阔了作家的视野，密切了作家与现实和人们的关系，也影响了他们对文学体裁的选择。由于没有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作家们需要寻找便于把握时代变动的文字形式。加上战时出版条件困难，文学刊物篇幅有限，短小精悍的作品特别受欢迎。而散文就是这种既便于把握时代变动又短小精悍的作品形式之一。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无意地成全了散文创作。经受战斗的洗礼，现代散文获得了丰收并且显示出特异的艺术光彩。桂林文化城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桂林文化城期间，先后有千余名文化人在桂林生活过，著名的作家就有茅盾、巴金、郭沫若、柳亚子、夏衍、胡风、周立波、聂绀弩、宋云彬、黄药眠、何家槐、孟超、彭燕郊、韩北屏、司马文森、邵荃麟、王鲁彦、王西彦、芦荻、丽尼、李广田、何其芳、丰子恺、廖沫沙、秦牧、秦似、周钢鸣、蹇先爱、艾芜、艾青、姚雪垠、田汉、欧阳予倩、端木蕻良、骆宾基、熊佛西、华嘉、林林、凤子、缪崇群、穆木天、彭慧、范长江等。其中大部分作家在旅居桂林期间创作过散文。他们在桂林出版了

大量的散文集，如巴金的《旅途通讯》、《旅途随笔》、《无题》、《海行杂记》和《忆》，茅盾的《见闻杂记》、《茅盾随笔》、《孟夏集》和《速写与随笔》，柳亚子的《怀旧集》，聂绀弩的《早醒记》、《蛇与塔》、《历史的奥秘》和《婵娟》，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和《缘缘堂再笔》，李广田的《回声》、《灌木集》和《诗的艺术》，何其芳的《还乡记》，何家槐的《冒烟集》，秦似的《感觉的音响》和《时恋集》，孟超的《长夜集》和《未偃集》，宋云彬的《骨鲠集》、《破戒集》和《浅草》，范长江的《西线风云》和《西北战线》，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和《过客》，夏衍的《此时此地集》和《长途》，艾芜的《杂草集》，熊佛西的《山水人物印象记》，秦牧的《秦牧杂文》等。

抗战期间，大批书刊出版、印刷企业汇集桂林，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各种刊物有二百八十余种。这显然为散文的发表、刊行提供了充足的阵地。1940年8月20日创刊的《野草》是桂林文化城期间的一个重要刊物，也是抗战期间中国唯一的以刊载杂文为主的文艺月刊。刊物的编辑工作最初由宋云彬、孟超、夏衍、秦似、聂绀弩负责，从第2卷第1期起（1940年4月1日）由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负责，从第3卷第5期起（1942年2月15日）由秦似负责。发行方面由陆风祥负责，桂林科学书店负责总经销，特约经售的是重庆新生图书公司。印刷方面，初由科学印刷厂负责，从第3卷第6期开始由中国科学公司负责。从第3卷第1期起（1941年9月15日）增设国外版总经销。1943年6月被国民党政府以“节省纸张”为名强制停刊。《野草》杂志在桂林发行的时间近三年，共出版了第5卷第29期。销量由最初的每期3000份增至1万多份，成为抗战时期发行量突破万份的刊物，深受全国各地读者的欢迎。《野草》停刊后，刊物的主编秦似逃难到了香港。在香港，秦似积极地为《野

草》的复刊奔走。当时大批的作者和文化人迫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压力也云集到文化氛围比较浓的香港避难，这些作者和文化人都为《野草》的复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野草》于1946年10月1日在香港复刊。由于资金的限制，复刊后的《野草》只能以丛书的名义出版，共出12期，历时两年。1949年，《野草》新辑两期在香港刊出，与此同时，《野草》丛书两集13本问世。除了《野草》，桂林还有《正路》、《全面抗战》、《文化》、《战时艺术》、《克敌》、《自由中国》、《国民公论》、《文丛》、《宇宙风》、《广西教育通讯》、《十日文萃》、《东方战友》、《少年战线》、《逸史》、《中学生》、《西南儿童》、《抗战文化》、《教育与文化》、《抗战时代》、《工余生活》、《西南青年》、《湘桂月刊》、《笔部队》、《活力》、《广西妇女》、《文化通讯》、《耕耘》、《战时描集》、《国文月刊》、《正气》、《新道理》、《文化线》、《青年生活》、《前锋》、《文协》、《现世间》、《狮子吼》、《半月文艺》、《妇女岗位》、《国防周报》、《文艺新哨》、《新工人》、《文艺杂志》、《文艺生活》、《文学批评》、《文艺杂志》、《旅游杂志》、《振导月刊》、《创作月刊》、《科学知识》、《半月文萃》、《文学报》、《国文杂志》、《文学创作》、《新儿童》、《青年文艺》、《人世间》、《自学》、《艺丛》、《明日文艺》、《大千》、《万方》、《文学杂志》、《新文学》、《正谊》、《国民》、《当代文艺》等刊物，也刊载了大量的散文。桂林文化城的散文创作非常活跃。

散文集的大量出版和散文的大量发表使桂林文化城的散文创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不少旅桂作家创作的散文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风格。其中最突出的是巴金。巴金在抗战时期先后三次来到桂林。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贯穿了桂林文化城的整个发展时期。抗战时期独特的境遇造就了巴金独特的心态以及他作品中独特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国家民族沉重灾难的降

临，个人生活境遇的完全改变，现实生存困境的一再凸显，以及对当时国情的不断认识，使巴金的散文创作既结合了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又融会了个人对国家与民族的思考。巴金在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大多是以黑夜为背景的，并形成了以黑夜为核心包括梦、灯、火的意象群。这一意象群凸显了光明和黑暗的两极。灾难的战争年代如漫漫长夜，一片漆黑，梦想和灯光是黑夜中的希望；战争如一把火，烧毁了人间的幸福和宁静，但在灰烬里正孕育滋长着新的生命之火。光明和黑暗在巴金的散文中互相衔接、交织、融合，形成了他这时期散文独特的黑暗/光明对比结构。黑暗与光明的对比和较量，使巴金的很多散文都于“山重水复”之中，不断开创“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实现思想和情感上的升华。而光明与黑暗较量的结果，总是光明战胜黑暗。在经历每一次窒息与苦闷的情感受难之后，巴金最终总能在隧道尽头的光明的引领之下走出精神的彷徨，背负着对光明和希望的信念上路。所以巴金的散文往往在结构上有一个“顶点”，即先书写情感、心理上的极度窒闷、徘徊、压抑，之后又反弹出悲哀后的抗争与挑战，最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仅是纯粹的结构技巧，更是内蕴着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巴金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巴金这些散文创作的过程就像是一次次穿越黑暗的飞翔，而且这种穿越黑暗的飞翔来之不易，艰难而伟大！黑暗/光明对比的结构，“情感顶点式”的结尾把巴金散文意象的象征意蕴推向极致，从而显示了巴金这一时期的散文追求光明、热爱生活、坚持信念、充满理想与希望的主题。显然，巴金在桂林文化城期间创作的散文自成一家，在他自己的整个散文创作历程中也独具特色。而且，后来被研究者反复提及的《随想录》中的自省精神、对于理想和信念的执著坚持、对于生命的思考和叩问、梦的独特意象都可以在巴金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找到渊源。其他如聂绀

弩、秦似、宋云彬等桂林文化城作家的散文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桂林文化城的散文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大部分与抗战有关。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对多维的抗战图景的描绘。

在抗战的烽火和反抗的义旗被举起之时，社会和生活因战争的爆发而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也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当时，以反映全社会各界人民积极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桂林文化城迅速增加。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出现的以记录人民抗战为对象的散文可以说是类型多样、色调丰富，既有对前线战士英勇战斗场面的真实记录，也有对普通民众积极援战的朴实描述，还有对文人自身抗战决心的深沉书写。这些散文交相辉映，在总体上形成了一幅多维的抗战图景。

第二，对时事和战争的记录。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号角，在有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发生的历史时刻，敏感而又敏捷的报告文学往往成为记录与反映时代生活的急先锋。抗日战争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反侵略战争，随着它的爆发，报告文学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得到了极为迅猛的发展。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坛上，报告文学的成就极为突出。桂林文化城的报告文学创作曾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39、1940年，司马文森、夏衍、姚雪垠、杨刚等创作了反映南中国战场战事的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夏衍的《长途》等；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42年香港沦陷后，茅盾、萨空了、华嘉、谢加因等从香港脱险辗转来到桂林，创作了描写香港战事以及他们的脱险经历的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品主要有茅盾的《脱险杂记》、萨空了的《香港沦陷回忆》等。抗战时期桂林文坛的报告文学作者众多，

题材宽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形成了一道亮丽热闹的风景。

第三，对灾难记忆和艰辛生活的反映。

抗日战争粗暴地打破了作家们相对平静的书斋生活，造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空前的作家大流亡。抗战时期的旅桂作家们大部分是在广州、武汉、香港等地沦陷后，冒着炮火，历尽波折与艰辛来到桂林避难、写作的。他们的脑海里承载着过多关于战争梦魇般的沉痛记忆。在记忆里，他们看到了烽火，听到了炮声，闻到了血腥，经历了苦难。这些带着战争灾难记忆的作家来到相对稳定的桂林后，并没有获得他们所渴望的平静的创作心境。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书商盘剥、读者群购买力下降等种种因素，使得作家们的生活日益贫困。再加上当时文网森严，炮火不断，他们的写作更是举步维艰。旅桂作家们饱受了战乱时期颠沛流离之苦和异地求生之艰。生的苦闷与死的威胁一直压逼着他们，使他们难于喘息。桂林文化城的散文创作中有相当多的篇章真实地反映了作家们艰辛的生活和苦闷的心态，流露出了他们对日军暴行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的强烈控诉，也表现了他们抛却个人艰辛，控诉战争，高呼抗战，期盼胜利的拳拳爱国之心。

第四，战争背景下对生命的观照。

战争让人们经受了巨大的磨炼，让人们更切身地体验了生与死并思考生命的价值。文学也相应地对生命有了不同寻常的深刻体会和领悟。在战争背景下关照生命，思索生命与战争纠结而成的复杂命题是桂林文化城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反映这一主题的散文既有对自然性意义上的生命的怜悯与尊重，也有对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命价值的理性思索，更有对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命力的礼赞。忧思徘徊与慷慨激昂相交织书写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雄浑、悲壮的一章，给新文学史留下了可歌可泣、震撼人

心的光辉一页。它们将永远警示读者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善待生命。

第五，对妇女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女性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整个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和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与关注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继“五四”之后，中国妇女真正大规模地参与社会、介入历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爆发后，已经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中国职业妇女纷纷投入到抗战救亡运动中，从而扩大了抗战初期妇女的职业活动范围。然而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由于战时经济凋敝，国统区出现了一股提倡“妇女回家”的逆流，一些人公开宣扬妇女不应该从事职业活动，而应该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各行业开始风行裁撤拒用女职员。为了捍卫妇女的职业权，一些先进妇女和进步男性纷纷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在1940—1942年间主要集中在福建、重庆、桂林三地形成了一场“妇女是否要回家”的女权论辩。其中桂林的女权辩论最为突出，实绩较大，影响较广。这场女权论辩，成功地推动了广大妇女民族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在这场辩论的推动下，桂林出现了大量的真实再现当时妇女的生活以及参与抗战的剪影，并对女权问题、男女平等、女性角色、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等问题进行讨论、探索和思考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某些观点，不仅当时振聋发聩，时至今日仍不乏现实意义。

第六，对抗战中不良现象的讽刺、暴露与批判。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由于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逐步加剧，国统区社会的日益黑暗，作家们渐渐地认识到了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既有血淋淋的英勇斗争，也有荒淫无耻和自私卑劣。文学创作也因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与抗战初期大部分作家对战争抱着单纯的乐观态度不同，这一时期，“暴露